

完成“最后一次救死扶伤”后她走了 却给了3条生命新生

“听说器官捐献者是一名医护人员，尽管我们不认识她，但真的谢谢她的大爱”。10月18日下午，一名接受移植手术的尿毒症患者家属感激说道。肾脏的捐献者，叫游湘萍，是来自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在临床护理岗位上工作了25年。在完成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救死扶伤”，游湘萍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9岁，但是她捐献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却让三名素昧平生的患者续存了生的希望。

游湘萍1995年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在龙山县人民医院临床护理岗位上工作了25年，先后担任骨科护士长、门诊部主任，2020年担任人事科主任。工作30年来，游湘萍始终如一地奉献着自己，以温柔的双手抚慰患者的伤痛，用温暖的笑容给予患者力量。

她曾无数次熬夜加班，与医生们一起从死神手中夺回无数垂危的生命，日夜坚守在岗位，带领护士

姐妹们为患者的健康拼尽全力。她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如同亲人一般，细心呵护，无微不至；专业素养和仁爱之心，让她成为了患者心中的好护士，同事眼中的楷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0月8日晚，游湘萍因骑车摔倒，造成严重的颅脑外伤，在历经7个多小时的手术后，被送至重症医学科（ICU）治疗。在重症医学科经历了9天的治疗后，游湘萍被宣告脑死亡。就在这绝望的时刻，游湘萍的家属做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决定——捐献器官，让她的生命以另一种崇高的方式延续。

10月17日，这个悲伤的日子，游湘萍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9岁。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器官捐献与获取组织（简称OPO）办公室和湘西州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游湘萍的家属完成了器官捐献相关流程。

器官获取手术前，医院和红十字会为她举行了庄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手术室外，同事们怀着崇敬与悲痛的心情等候、默

哀、恸哭，与游湘萍作最后的道别。他们深知，这不仅是对游湘萍的不舍、尊重和缅怀，更是对生命的敬畏。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她依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自己的使命，完成了最后一次‘救死扶伤’。捐献的器官，将为那些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机，让他们有机会再次拥抱美好的生活。”龙山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王厚平在游湘萍完成器官捐献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动容地表示。

“姐姐是个善良的人，平时对人、对事都很热心，捐献器官能为其他人带去生的希望。我相信，这也是姐姐愿意的。”游湘萍的妹夫向荣坤表示，家人希望通过另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给所有关爱她的亲人、朋友、同事留下念想。

据悉，游湘萍捐献的肝脏，也同时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简称COTRS），已经第一时间移植在了急需器官等待的一名肝衰竭患者体内。

本报综合自新湖南·湘健频道、长沙晚报、政法频道
通讯员 李钊 王耀磊

医患关系 须重聆听与尊重

周五，如往常般到医院看诊，此刻，最让我开心的莫过于黄婆婆的出现。之前她离开医院时感激又不舍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个月前黄婆婆跌倒，碰撞到右边大腿部位，加上年老骨质疏松症的影响，造成股骨断裂。考虑了手术会带来的风险和问题，黄婆婆和家人决定采用牵引法治疗骨折，排除了手术治疗。黄婆婆也依照医生的吩咐配合，并在治疗后的几个星期内，不断地运动两边下肢。医生也定时为黄婆婆进行X光检查，以确保骨折部位不会走位。

黄婆婆住院时期，护士、实习生、病房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喜欢她。她为人简朴、随和，也不斤斤计较，虽然年过八旬，还一直对年轻一辈不停地道谢，说话也非常客气。

住了4个星期后，医生为黄婆婆进行X光检验，发现她的骨折恢复得非常好。自然地，黄婆婆也开始利用支架帮助自己行动，再过一个星期，黄婆婆出院了。

出院后的2个月里，黄婆婆很细心、听话地依着医生的吩咐自行进行物理治疗。复诊时，竟然能够用单边手握的支架走路。查看黄婆婆做的X光，我非常开心地告诉她，股骨骨折已复原得非常好，再过一个月，她可以完全不需要靠拐杖行走了。

医生常面对许多吹毛求疵的患者和家属，任医护人员如何尽心尽力都不能让他们满意。当然，对医护人员有要求和意见是好事，但是有的患者和家属所要求的都是对自己有利，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医生——千依百顺，然后摆出“顾客都是对”的态度。殊不知，很多人往往忘记了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条件：聆听、尊重、体谅与宽容，这一点，无论是对医生还是患者，都是一个道理。

重庆市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师 王森

死亡咖啡馆： 讨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生命教育对每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面对肿瘤疾病时，死亡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侯芸华表示，在对患者进行一对一访谈时，几乎所有患者在得知自己可能得了肿瘤的那一刻，都会想到死亡。

在医疗环境中，谈论死亡仍然是避讳的。例如，“4”这个数字经常被刻意回避，住院楼中可能没有14层，病房里也不会设置14号床位。

“考虑到患者可能难以立即接受这样的概念，我们决定先从医务人员入手，对医生和护士进行死亡教育。”侯芸华解释道。为此，她想到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死亡咖啡馆”。这个概念最早由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兹于2004年提出，鼓励人们在一个温馨的咖啡馆中，一边品尝着咖啡和蛋糕，一边自由地交流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想法。2011年，全球首家“死亡咖啡馆”在伦敦，这个概念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在参加了由上海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策划的“死亡咖啡馆”活动后，侯芸华深受触动，恰好闵行医院社工部的张昌英主任接受了死亡咖啡馆带领人培训，成为带领人，他们便一起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次专为血液肿瘤科医护人员量身定制的“死亡咖啡馆”人文沙龙活动。

在活动中，大家讨论了一个主题：“有质量的死亡”。如果疾病带来的死亡无法避免，作为患者，他们希望能够自主选择重大的医疗决策，家人也能尊重自己的愿望。然而，现实中，虽然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拥有选择权，但这种权利往往在传统文化观念和家庭伦理的影响下无法得到保障。

为了改变这个困境，闵行医院血液肿瘤科进行了一系列的需求调研工作，经过与近100位患者及家属的深入访谈，团队发现，的确拥有疾病知情权与自主权是大多数患者的真实诉求。

生命教育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它要求我们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生命的起源、成长、衰老和死亡。而“死亡咖啡馆”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让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地讨论和思考这些深刻的话题。

作者：汪哲慧 来源：中国广告杂志



“您放心，您一定可以战胜疾病！”

——记我和ICU爷爷的故事



9年前，我正式成为一名临床护士。6年前，我选择成为一名重症护士。曾有人问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晚夜班多且工作强度大，你不觉得累吗？”有时候，身体上确实会累，但每当看到患者因团队合作得到成功救治，因我的细心护理而给他们带去温暖，内心就会深感自豪。

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吃完午饭后，刚想坐下来休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病房的宁静：“ICU吗？这里是急诊科，有一名呼吸衰竭的患者需要转往你们科室，请你们医生来会诊！”挂了电话后，我赶紧和同事做好相应准备。几分钟后，患者被平车推入ICU，他是一位瘦弱的老人，面色青紫，口唇发绀，医生立即上了无创呼吸机，就在我准备为爷爷戴好呼吸机时，爷爷带着情绪说：“我不想戴着这个，戴着不舒服。”我赶紧跟爷爷解释：

“爷爷，这是救命的，如果不戴，就得往嘴里插根管子，会更不舒服，您选择哪一种呢？戴上无创呼吸机时，您只需要正常的呼吸，机子会跟着您的呼吸节奏来呼吸的。”爷爷听罢，乖乖地戴好了呼吸机面罩，配合接下来的治疗。

在呼吸机辅助呼吸后，爷爷的呼吸频率变得正常。不一会，爷爷指着嘴巴，我问爷爷是不是口渴想喝水了，他点了点头，我立即给爷爷倒了杯温水，他喝了几小口后就不想喝了。十多分钟后，他脱下无创面罩说：“要不你还是让我老伴进来陪我吧！都说住到ICU就很难出去，我怕。”听后，我立马安慰道：“爷爷您只要好好配合我们治疗，可以好转出科的。因我们科室的特殊性，不允许家属进来陪同，但他们都在外面等着您啦！”爷爷听后，握着我的

手说：“谢谢你，小姑娘。”我笑着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放心，您一定可以战胜疾病。”

后面的几天，我教会爷爷缩唇呼吸、吹气球来锻炼呼吸功能，陪着他从床旁坐着到下床慢慢行走，爷爷也很争气，病情迅速恢复，出科时他激动地向我们说着：“谢谢！谢谢！”

住在ICU的患者，没有家人的陪伴，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就只有我们，我们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化解着患者的担忧和顾虑，用扎实的操作技术和温柔的细语，给予患者帮助与鼓励，让他们克服沮丧，积极勇敢地面对疾病。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 颜姣